

缶艺薪传话东迈

■操声国

2023年为西泠印社建社120周年,特别是11月份,印社以“五个展览+五场会议+三个研讨会”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全方位展示百年名社的人文意蕴、学术底色和综合实力。吴昌硕先生也因担任社长110周年,再次成为文化机构纪念和学界、艺坛研究的热点。吴昌硕在近现代是一位承前启后极其重要的艺术宗师,无论是对其艺事、思想,还是所处时代存在的意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挖掘。吴昌硕和西泠印社一样,过百年声誉不衰,除了自身成就的不朽,缶庐弟子的薪火相传和家属后裔的高风亮节也起到了较大推动的作用,同样也是值得书写和剖析的。

今年是吴昌硕之子东迈先生逝世60周年,作为吴东迈故里的文博单位安吉县博物馆展开了纪念活动,以馆藏作品为主,联合家属和私人藏品为辅,策划了“缶艺薪传——吴东迈作品展”。今就馆藏吴东迈作品《东篱蔬果图》,来谈谈先生的艺术特点及他人眼中的吴东迈。《东篱蔬果图》为立轴,纵107厘米,横46厘米,题款内容为:“蔬菜一畦正肥绿,东篱雨过又瓠瓜。陆放翁句,安吉吴东迈。”钐印两方,一为:东迈(朱文),另一为:石樞书画(白文)。描绘对象为蔬菜、菊花、南瓜、萝卜四种农家风物,构图从左下角延伸到右上角,成斜角势,款书为一炷香形式,继承了乃父吴昌硕的风格样式,用笔虽不及吴昌硕以金石入画的雄强,画面也缺乏郁勃之气,却能古厚蕴藉、从容不迫,这很多程度上和其性格有着很大的关联。美术理论

家邵洛羊先生在上海中国画院筹建之时与吴东迈多有交集,在《吴东迈吴长邨父子书画集》序中言:“慈眉善目,清癯散淡,宛如野鹤闲云,在人群中谦谦礼让,大小会议他总是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很少说话。”从以上这段文字可大略知晓东迈先生与吴昌硕性格的差异和处世风范。画风呈现出的气质也截然不同,中国人所说的“画如其人”和西方人理解的“风格即人”都是同一个道理。再从四种不同的农作物入画和所选题款内容,可以看出吴东迈有着很深的家乡情结和平民思想,作品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朴实无华的气息来。

吴东迈之子长邨先生《我的祖父吴昌硕》一书中有篇撰写父亲的文章“传人吴东迈”,最为详尽其艺术与道德。今抄录一段:“东迈先生平生事迹甚丰,经概括归纳,整理为十点,略陈如下,以明视读。(一)东迈先生性至孝,昌硕老人病笃,先生曾效古人割股疗亲,其法虽不可取,但其精神实令人感动。(二)昌硕老人去世后,为了弘扬老人艺术,传之久远,东迈先生曾斥巨资创办昌明艺术专科学校于上海黄陂路兴安路口(贝勤路旧名望志路口),聘王一亭为校长,自任副校长,司理全校教务,培养出许多人才,如刘伯年,邱英杰(即邱及)、罗铭、冯建吴等著名画家。(三)东迈先生为人敦厚,助人为乐,常多方设计接济贫困画家,如任董叔、王个簃等。(四)先生非常爱国,抗战期间曾多次捐款,积极响应抗日救国,还曾亲自将物资送往上海抗战前线,慰劳抗敌英雄将



吴东迈 东篱蔬果图 107x46cm

士。(五)学生邱英杰,中共地下党员,被叛徒出卖四度被捕,先生花巨资两度营救其出狱。邱英杰在解放后,更名邱及,曾任周恩来总理外事秘书、华侨事务委员会第

一司司长和北京语言学院党委书记。(六)解放后,先生将大量珍贵藏书分赠与全国各地著名图书馆。(七)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择地在杭州西泠印社观乐楼,辟为吴昌硕纪念室。先生将大量昌老遗作遗物,无偿捐赠与浙江省博物馆(经手人为沙孟海),以充实吴昌硕纪念室内容,供学术界、美术界参观。(八)1960年,先生又整理出大量昌老遗作遗物,再度捐献与浙省博物馆(经手人同上)。(九)故乡安吉县筹备建立吴昌硕纪念馆,先生又捐献大量先人遗作遗物及其他文物,当时经手人是周绍文。(十)先生曾著书两部,即《艺术大师吴昌硕》(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吴昌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画家丛书之一”),深得学术界、美术界重视,受到日本学术界注意,有日本著名学者足立丰译为日文,在日本刊行为畅销书。影响及于海外东瀛,既宣扬了祖国文化艺术,亦弘扬了吴昌硕先生艺术的伟大成就。先生对故乡文化、教育方面也很关心,曾资助贫困学生解决学费及书籍等等,对家乡贫苦戚友时加资助,深得家乡各方好评。”

从吴长邨对其父归纳的十点,更让晚学后辈看到的是一位充满温情且有家国情怀的文人艺术家。当下画坛活跃,思想多元,在传承和开拓艺术的同时,品德的加持与社会担当至为重要,这也是我们缅怀吴东迈先生和做这个展览的意义所在。

(作者供职于安吉县博物馆)

赵熊:心中的艺,湖上的舟

■俞越 张若瑶

“我是狗熊的‘熊’,”爽朗的笑声,幽默的话语,是我们对于这位来自陕西的艺术家的第一印象,而他对于陕西书坛、印坛的影响力,更令我们敬佩,他就是陕西省书协名誉主席、西安终南印社名誉社长、西泠印社副秘书长赵熊。

从好玩到“入门”

上初中的时候,不知何时起,赵熊的班上兴起一阵“刻章潮”,男孩们放学后的第一大娱乐项目就是相互之间刻章玩,再跑回家里找来印泥,往课本上、练习本及书籍上盖一盖,就能收获满满成就感。那个时代没有电脑和网络,一帮十几岁大的孩子却也能找到无限乐趣。

而因为祖父曾想学刻印,赵熊家里有几方请人刻的石头印章,还有各式大大小小的刻刀,这愈加勾起了他的浓厚兴趣。赵熊与篆刻的结缘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某天他在家里找到了一本民国时期孔云白编的《篆刻入门》,一切仿佛命运的指引,从此开启了他的篆刻生涯。

1965年,西安市的工业局和教育局联合挂靠在西安人民搪瓷厂,成立了一个全日制美术专业班,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赵熊便是其中一员:在班上,他给不少

同学都刻过印,也给专业老师刻过。1970年,赵熊被分配到了西安日化公司,主要生产食用油、肥皂等。当时肥皂、香皂的制造,都需要刻模具。厂里正好缺相关人材,且认为做模具和篆刻也很像,就培养赵熊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在那段特殊时期,我在书法篆刻方面的才能就派上了用场,书写、刻了很多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和毛主席的诗词,书法、篆刻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赵熊表示,“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和整个时代的发展脉络是息息相关的,”加上自己本身对篆刻的喜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艺术道路。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文化精神滋养着他的诗意文心。

“偷跑”半天,只为到西泠印社

赵熊和西泠印社很有缘分,不过总是伴随着一点点“好事多磨”的意味。

在西安日化公司上班期间,1972年,单位派赵熊去上海制皂厂学习。“上海和杭州这么近,我要去西泠印社看看。”说走就走的赵熊跟师傅沟通请了假,在一个周末提前半天坐上火车来到杭州。来到西湖边的孤山,朝拜西泠印社。虽然那时的西泠印社基本上还没恢复,牌匾也没剩多

少,但是在他心里却是祖庭一般存在的西泠印社,终于得见。

在上海学习的三个月时间里,学习安排紧、任务重,但赵熊还是抓紧机会,在返回西安前又一次来到杭州。他在西泠印社的服务部(杭州书画社)看到一本1960年代出版的《西泠四家印谱》,这令他欣喜万分。一问才得知,这些专业的书籍只卖给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这令他辗转反侧,再三告诉店员一定要帮他留下书后,立马写信给西安文物局的朋友,拿到了一张证明。后来终收到从西泠印社寄来的心心念念的印谱。现在,这本书已经快被他翻烂了。

几年后,赵熊与朋友再次来到孤山,但印社还没有恢复活动,也不接受新会员的加入,他只能再一次无功而返。不过命运兜兜转转,最终他还是如愿加入了西泠印社。

致力于推动西北印学的发展

赵熊在书、画、印创作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融众艺为一体。他在篆刻艺术上下的功夫最大,取得的成就亦最高。他梳理印史,溯承“古法”而心生“新我”,无论是朱文还是白文,章法布局奇肆,金石气息迎面,逐渐形成了法理同参、雄浑古穆的篆刻风格。他的刀法、笔法、篆法互为力借,在写实和表意之间而达情,以精妙的刀笔语言给艺术以富含诗意的阐释。

除自身发展外,赵熊一直致力于推动西北地区书法篆刻的发展。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是古玺印文化的重镇,明清形成的“文人印”的重镇则是江浙地区。在那个“文人印”风潮兴起之时,西北地区却几乎成了空白区。在面对篆刻艺术时,江浙的篆刻家们提出了“印宗秦汉”,但作为秦汉印故乡的西北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依旧没有激起篆刻艺术的浪花,更别提组织和团队力量了。

1979年6月,终南印社在西安成立,最初的17位社员里就有赵熊,担任理事一职,后又任副社长、社长。如今,终南印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国内外社员200余人的印学大社。

他还积极组织西北印人与西泠印社的互动、交流。今年10月,在赵熊的提议下,“西北望·陕甘宁新四省(区)社员书法篆刻展”拉开帷幕,这是西北地区西泠印社社员第一次集结在一起办展览。他表示,虽然只有15位社员,从数量上和江浙发达地区有不小的差距,但展览聚合了西北五省(区)的篆刻力量,一定能给西北印人有所启发,有所激励,进一步促进西北地区篆刻的发展。

“要拉近西北地区篆刻和南方发达地区的差距,要通过更多的展览、讲座、培训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篆刻艺术,尤其是年轻的优秀篆刻家们加入进来,合力提高西北地区篆刻水平。”赵熊表示。